

李贽评价张居正为“宰相之杰”原因探析

李桂生 胡小莲

李贽（1527—1602）和张居正（1525—1582）都生活于明朝嘉靖、隆庆、万历时期。李贽是一位狂怪的思想家，张居正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两人既非同窗，又非好友，更非同僚，而且一为“首辅”，一为“隐士”，甚至既不曾互致问候，亦无谋面契谈。然而，李贽却对张居正有极高的推崇和赞誉，在谈到当时著名学者何心隐与张居正关系时说：“何公，布衣之杰也，故有杀身之祸；江陵，宰相之杰也，故有身后之辱。不论其败而论其成，不追其鉴而原其心，不责其过而赏其功，则二者皆吾师也。”^①可见李贽对两人都推崇备至。张居正为“宰相之杰”的评价即出于此。

李贽是一位很少服膺他人的狂怪之人，他对张居正的推崇和赞誉，不能不令人对他们的思想与精神可能具有共同性产生联想。李贽赞誉张居正是“宰相之杰”，与其精神和思想必有契合之处。除了客观评价之外，还注入了相应的欣赏与同情。有人说何心隐是被张居正所杀，李贽则公开为张居正辩白。李贽直言道：“何公死，不关江陵事。”其原委是：“江陵为司业时，何公只与朋辈同往一会言耳。言虽不中，而杀之之心无有也。及何公出，而独向朋辈道‘此人有欲飞不得’之云，盖直不满之耳。何公闻之，遂有‘此人必当国，当国必杀我’等语。则以何公平生自许太过，不意精神反为江陵所摄，于是怵然便有惧色。盖皆英雄莫肯相下之实，所谓两雄不并立于世者，此等心肠是也。自后江陵亦记不得何公，而何公终日有江陵在念。”^②李贽分析何心隐和张居正的心态，说他们是“英雄莫肯相下”，“两雄不能并立”，而何心隐“自许太过”，不意见了张居正，精神却为其所摄，故“怵然便有惧色”，以为张居正必欲杀之而后已。张居正也只说何心隐“有欲飞不得”之语，虽言语不合，意气相左，然杀之之心无有也。此后张居正便不记得此事，而何心隐却对此耿耿于怀。这些话虽出于李贽的主观推论，但其心理分析鞭辟入里，可谓一家之言。然而，为何风传何心隐死于张居正所授意？李贽分析道：“盖惟得罪于张相者有所憾于张相而云然，虽其深相信以为大有功于社稷者，亦犹然以此举为非是，而咸谓杀公以媚张相者之为非人也。”^③李贽所述之意是，得罪于张居正者对张居正必然心有怨恨，所以把何心隐之死归咎于张居正，虽然他们也深信张居正大有功于社稷，但是他们认为害死何心隐就是一个大错误，并且充当刽子手以向张居正邀功的官员根本不是人。李贽在《焚书·答邓明府》中细说何心隐不想死都不成的原委：“偶攻江陵者，首吉安人。江陵遂怨吉安，日与吉安缙绅为仇。然亦未尝仇何公者，以何公不足

^① 《答邓明府》，《李贽文集》第一卷《焚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4页。

^② 《答邓明府》，《李贽文集》第一卷《焚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4页。

^③ 《何心隐论》，《李贽文集》第一卷《焚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82页。

仇也，特何公自为仇耳。何也？以何公‘必为首相，必杀我’之语，已传播于吉安及四方久矣。至是欲承奉江陵者，憾无有缘，闻是，谁不甘心何公者乎？杀一布衣，本无难事，而可以取快江陵之胸腹，则又何惮而不敢为也？故巡抚缉访之于前，而继者踵其步。方其缉解至湖广也，湖广密进揭帖于江陵。江陵曰：‘此事何须来问，轻则决罚，重则发遣已矣。’及差人出阁门，应城李义河遂授以意曰：‘此江陵本意也，特不欲自发之耳。’吁吁！江陵何人也，胆如天大，而肯姑息此哉？应城之情状可知矣。应城于何公，素有论学之忤，其杀之心自有。又其时势焰薰灼，人之事应城者如事江陵，则何公虽欲不死，又安可得耶？”^①由此可见，李贽认为何心隐之死与张居正没有关系，而是那些被张居正得罪的人混淆视听，移祸于张居正，以发泄自己心中的不满。史载“终万历世，无敢白居正者”，^②李贽却敢为张居正辩白，除了其狂怪、大胆的个性之外，还有以下原因。

一、张居正改革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李贽未能实现的政治理想和人生抱负，寄托了李贽的理想情怀和精神追求。

李贽以狂怪闻名，削发为僧而不受戒，精研佛道而在芝佛院悬挂孔子像，其思想深处仍是儒家的“修齐治平”。他虽常常与上司抵触，但清正廉直，为政简朴，受民爱戴，且不为世俗所沾染，而能保持心灵的一方净土，从不收受贿赂。由于不满官场的污浊氛围，加之不受拘束的个性，所以弃官归隐，过着抛亲弃家、寄寓他乡、著述讲学的生活。然而在其内心深处，仍然不忘功名之念，所以悲愤无奈地说：“大丈夫生于天地间，太上出世为真佛，其次不失为功名之士，若令当世无功，万世无名，养此狗命，在世何益？不如死矣。”^③李贽虽然反儒批儒，然其所反所批实为俗儒陋儒，非真儒也，其思想与精神世界看似矛盾，实则有其一以贯之之“道”，那就是孔孟之道。李贽自剖心迹说：“夫卓吾子之落发也有故，故虽落发为僧，而实儒也。是以首纂儒书焉，首纂儒书而复以德行冠其首。然则善读儒书而善言德行者，实莫过于卓吾子也。”^④

李贽对社会的批判，对当时某些人物的批判和嘲讽，并不意味着他对整个统治集团的否定，也不意味着他对专制制度的失望和对抗，他只是既看不惯社会及官场浊流，又无力改变现实，所以采取嬉笑怒骂的狂怪方式来发泄心中的愤懑。深藏于内心者，仍然是儒家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理想。故李贽坦诚地说“余自幼习孔氏之学矣，是故亦以其学纂书焉。”^⑤

李贽早年求取功名，殊多曲折。嘉靖三十一年（1552）中举后，历任河南辉县教谕、南京国子监教官、北京国子监博士、礼部司务、南京刑部主事、南京刑部员外郎、姚安知府。万历八年（1580）李贽五十三岁，知府任满，从此不再为官。李贽所任之官多属清贫之职，

^① 《答邓明府》，《李贽文集》第一卷《焚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4页。

^② 《明史》卷二一三《张居正传》，中华书局，2000年，第3767页。

^③ 厦门大学历史系编：《李贽研究参考资料》（第一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8页。

^④ 《初潭集序》，《李贽文集》第五卷《初潭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页。

^⑤ 《初潭集序》，《李贽文集》第五卷《初潭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页。

而且中间多有停顿，生活极为艰辛，两个女儿死于饥饿。由此也可见李贽之志不在谋利禄，而在谋“遂志”。

张居正的改革恰好为李贽甚觉前景暗淡的大明帝国投入了一束阳光，亦为李贽干涸枯燥的心灵注入了一汪清泉。李贽与张居正仅相差两岁，可谓同龄人，对当时的政局有着共同的感受和理解，只是他们的表现方式不同而已。张居正在其书信中多次直指明朝日趋衰落的局势说：“其大者：曰宗室骄恣，曰庶官瘵旷，曰吏治因循，曰边备不修，曰财用大匮，其他为圣明之累者不可以悉举，而五者乃其尤大较著者也。”^①张居正改革正是针对以上严重弊病进行，提出了“省议论、振纲纪、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六条革新措施。张居正秉政后，着手整饬吏治，清丈田亩，改革赋税，充实边防，兴修水利，日显衰落的大明帝国由此焕发了生机。而这正是包括李贽在内的历代士子的理想和抱负。

二、李贽与张居正具有共同的思想世界和精神畛域，其思想与精神有许多相通和契合之处。

（一）有相近的政治理想和政治立场——致君尧舜，维护统治。张居正为万历帝师，以儒家经典《大学》、《中庸》、《论语》、《尚书》及《资治通鉴》教授幼主。此外，张居正还委托马自强等人编纂《帝鉴图说》，编选历代帝王得失成败中有典型意义的事例，以图说的形式对万历皇帝进行教导。《帝鉴图说》“略仿伊尹之言，考究历代之事。除唐、虞以上，皇风玄邈，纪载未详者，不敢采录。谨自尧、舜以来，有天下之君，撮其善可为法者八十一事，恶可为戒者三十六事。善为阳为吉，故用九九，从阳数也；恶为阴为凶，从阴数也。每一事前，各绘为一图，后录传记本文，而为之直解，附于其后。”^②其目的是培养出如尧舜般的君主，具体说就是能够“敬天法祖，听言纳谏，节用爱人，亲贤臣，远小人。”^③李贽则提出“天之立君，本以为民”^④，主张“因其政不易其俗，顺其性不拂其能”，^⑤达到政治清明、天下大治的目的。故李贽在姚安知府任上，政令清简，有时甚至在佛寺处置公务，而且身外之物一介不取，除俸禄外，了无长物。而对扶困济危、施行教化、抑制豪强、保护民众利益却尽心尽力。他用自己的行为践履了其政治理想，与张居正所要实现的政治理想是一致的。史载“居正劝帝遵守祖宗旧制，不必纷更，至讲学、亲贤、爱民、节用皆急务。”^⑥由此看来，张居正也不是完全反对讲学，而是主张讲学为政治服务。至于亲贤、爱民、节用等，与李贽的思想完全相同。

李贽与张居正都站在统治集团的立场，对义军有共同的称谓和态度，即盗贼须剿除。李贽虽是明朝时期的“思想犯”，但是这只是他在客观上“蛊惑”了一些人在思想上与朝廷乖

^① 《论时政疏》，《张居正集》第一册《奏疏》，武汉，荆楚书社，1987年，第495页。

^② 《进帝鉴图说疏》，《张居正集》第一册《奏疏》，武汉，荆楚书社，1987年，第104页。

^③ 《进帝鉴图说疏》，《张居正集》第一册《奏疏》，武汉，荆楚书社，1987年，第103页。

^④ 《李贽文集》第一卷《藏书》（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6页。

^⑤ 《论政篇》，《李贽文集》第一卷《焚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81页。

^⑥ 《明史》卷二一三《张居正传》，中华书局，2000年，第3762页。

离，而其真实意图则在于挽救日渐衰颓的大明王朝。所以，他们对待农民起义军有共同的称呼和态度。这就足以说明他们都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万历元年张居正致信殷正茂，指示他对活动在广东潮州一带的反明势力要斩草除根，并对渎职官员要严加惩处：“大抵南贼譬之蔓草，铲尽还生，从古以来经略南方者，皆未能以一举而收荡平之功，其势然也。今当申严将令，调益生兵，大事芟除，见贼即杀，勿复问其向背。诸文武将吏有不用命者，宜照敕书，悉以军法从事，斩首以徇。”^①李贽对农民起义同样持污蔑辱骂的态度。比如，宋江私放晁盖，使得他与吴用、阮氏兄弟上了梁山。李贽评点说：“梁山泊祸苗全在此处！”^②又说：“梁山泊贼首，当以何涛、宋江为首，朱仝、雷横次之。”^③吴用是军师，足智多谋，计赚朝廷命官上梁山，李贽就骂道：“吴用此人当千生万世作驴马！”^④宋江接受招安并奉命征方腊，梁山好汉与方腊义军自相残杀，梁山好汉损兵折将，李贽则大加赞扬，说是“死于王事，为得死所”。^⑤李贽评点水浒，虽也有对梁山好汉的赞扬之语，但那是为了与统治集团中的庸碌贪婪之官相对比，为统治集团没能罗致到如梁山好汉般的人才而叹息。李贽说：“宋公明最善用人，若有片长寸艺，无不留心，所以一百单七人死心塌地如七十子之服仲尼也。试想天下者，有如是之人，更当如何？”^⑥

（二）有相近的吏治思想——不满官场风气，不愿同流合污。张居正说：“为国之法似理身，元气欲回，神气欲扬。广中患不在盗贼，而患吏治之不清，纪纲之不振，故元气日耗，神气日索。”^⑦《明史·刘体乾传》记载当时的吏治云：“今之害最大者有二，冗官冗费是也。”^⑧张居正深知冗官冗费之害，整顿之方，一是裁汰冗员，二是加强考核，三是选贤任能。史载张居正“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⑨张居正创立和推行“考成法”，规定由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分别对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实行严密的监察与考核，使“月有考，岁有稽，不惟使声必中实，事可责成，即建言立法者，亦虑其终之罔效，不敢不慎其始矣。”^⑩李贽在姚安知府任上，施政清简，以不扰民为上，更不愿意随波逐流；批评假道学，揭露官场黑暗，抨击当时的社会“无所不假”、“满场是假”；¹¹指出当时的官员“种种日用，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厘为人谋者。及乎开口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我怜东家之饥矣，又思西家之寒难可忍也。”¹²

^① 《与殷石汀经略广贼》，《张居正集》第二册《书牍》，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35页。

^② 《明容与堂刻水浒传》十八回，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

^③ 《明容与堂刻水浒传》十八回，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

^④ 《明容与堂刻水浒传》六十二回，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

^⑤ 《明容与堂刻水浒传》九十一回，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

^⑥ 《明容与堂刻水浒传》七十回，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

^⑦ 《与殷石汀论吏治》，《张居正集》第二册《书牍》，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21页。

^⑧ 《明史》卷二一四《刘体乾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775页。

^⑨ 《明史》卷二一三《张居正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762页。

^⑩ 《明神宗实录》卷一九《万历元年十一月庚辰》，转引自韦庆远《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519页。

¹¹ 《童心说》，《李贽文集》第一卷《焚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92页。

¹² 《答耿司寇》，《李贽文集》第一卷《焚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9页。

(三) 具有共同的理财思想——农商皆本，为政须理财。张居正乡居养病期间，与工部都水司周汉浦讨论榷税及农商之事，云：“荆州榷税，视他处最少，居吴、楚上游，舟楫鳞萃，称会区焉。乃后稍稍寥寂，商旅罕至矣。汉浦周子始至，申甲令，釐宿弊，平物价，恤无赀。赋视旧额，务在轻贷，与人诵焉。张子曰：‘余尝与周子论始所建榷及后稍异者’。其略曰：‘古之为国者，使商通有无，农力本穡，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本穡以资商，则商病。故商农之势，常若权衡。然至于病，乃无以济也。’”^①为了消除农商相资而不相病的现象，张居正提出对策：“故余以为欲物力不屈，则莫若省征发繁科，以厚农而资商；欲民用不困，则莫若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②

李贽出身于商人之家，对商人的辛苦深表理解与同情，为商人大声疾呼，为商人饱受社会鄙视而鸣不平：“商贾利何鄙之有？挟数万之赀，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③他认为社会关系皆“市易”，说：“天下尽市道之交也。”李贽肯定社会关系中的功利性：“以利交易者，利尽则疏；以势交通者，势去则反。朝摩肩而暮掉臂，固矣。”^④李贽认为即使孔子与他的学生也是交易关系，云：“七十子所欲之物，唯孔子有之，他人无有也；孔子所可欲之物，惟七十子欲之，他人不欲也。”^⑤李贽把人际关系作为商品关系，认为学问也是一种商品，孔子与七十子相处便是商品交换，目的在于满足双方的需求。李贽赞扬那些大商人说：“天与以致富之才，又借以致富之势，畀以强忍之力，赋以趋时之识，如陶朱、猗顿辈，程郑、卓王孙辈，亦天与之以富厚之资也。是亦天也，非人也。若非天之所与，则一邑之内，谁是不欲求富贵者，而独此一两人也邪？”^⑥

张居正在实践中践履了李贽的理财主张。张居正发动的清丈田亩、一条鞭法为大明王朝积聚了大量的财富，缓解了其财政走向崩溃边缘的局势。张居正致信山东巡抚何来山，肯定他在清丈田亩中所作的贡献：“清丈事，极其妥当。粮不增加，而轻重适均；将来国赋，既易办纳，小民如获更生。”^⑦隆庆年间，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张居正在给隆庆皇帝的奏疏中详述国库窘况：“臣等备查御览揭帖，计每岁所入，折色钱粮及盐课、脏赋事例等项银两，不过二百五十余万，而一岁支放之数，乃至四百余万，每年尚少银一百五十余万，无从措处。生民之骨血已罄，国用之广出无经。臣等日夜忧惶，计无所出。”^⑧实际上，张居正采取了不少措施缓解财政困局。一是借鉴古代理财经验，开源节流，长远规划。张居正说：“古之理财者，汰浮溢而不鹜厚入，节漏费而不开利源。不幸而至于匮乏，犹当计度久远，以植国本，厚元元也。”^⑨二是允许边境开市，既可缓和边境关系，又可增加税收。张居正说：“甘肃开

^① 《赠水部周汉浦榷竣还朝序》，《张居正集》第三册《文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65页。

^② 《赠水部周汉浦榷竣还朝序》，《张居正集》第三册《文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65-466页。

^③ 《焚书》卷二《又与焦若侯》，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45页。

^④ 《续焚书》卷二《论交难》，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73页。

^⑤ 《续焚书》卷二《论交难》，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73页。

^⑥ 《李贽文集》第七卷《明灯道古录》（卷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57页。

^⑦ 《答山东巡抚何来山言均田粮蠲吏治》，《张居正集》第二册《书牍》，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060页。

^⑧ 《请停取银两疏》，《张居正集》第一册《奏疏》，武汉，荆楚书社，1987年，第41页。

^⑨ 《赠水部周汉浦榷竣还朝序》，《张居正集》第三册《文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66页。

市，已奉谕旨，悉如所议。其中有难遥度者，公自以便宜行之。务令事久，边境获安而已。市场似宜稍西，去西宁太近，则启宾兔垄断之心；去我边太远，则迂边民交易之路。”^①三是重商恤商，农商并重。韦庆远说：“明代自弘治以来断续出现，并逐渐高涨的重商恤商思想，历经六七十年的酝酿，是在隆庆中后期才被朝廷认可，并对原有的病商扼商政策作了较大幅度调整。”^②四是清丈田亩并实行一条鞭法，遏止了田亩偷税，增加了国库收入。

李贽在当时的士大夫中，是很有理财头脑的读书人，主张治理天下者必须善于理财。他评论《大学》云：“真正学问，真正经济，内圣外王，具备此书。岂若后世儒者，高谈性命，清论玄微，把天下百姓痛痒置之不问，反以说及理财为浊耶？尝论不言理财者，决不能平治天下。何也？民以食为天，从古圣帝明王无不留心于此者。故知《大学》一书，平天下之底本也。”^③

（四）有相近的军事思想，并同样具有深厚的兵学素养——重武备，精兵法。李贽既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也是一位兵学家。在其论著中，有不少篇章谈论军事，其中有《孙子兵法》阐释之作《孙子参同》，其军事哲学思想便是“六经与七书合而为一”，主张儒兵融合和互补。具体说来，主张兵食不二、人自为战；修道保法、仁诡兼用；重战慎战；禅兵合一；用兵可与乐成，不可虑始。李贽对明朝边防的忧虑不亚于张居正，把张居正视为阻挡北虏侵扰中原的万里长城。张居正死后，明朝却出现“边防无人”的困局。李贽谈及当时倭患与边警时说：“些小变态，便仓皇失措，大抵今古一局耳，今日真令人益思张江陵也。”^④

张居正不仅在其奏疏及书信中有不少内容谈论军事问题，而且据《湖北通志·艺文志》的著录，还著有《辑注武经七书》^⑤。在张居正提出的六条改革建议中，有一条是“饬武备”，云：“臣惟当今之事，其可虑者，莫重于边防；庙堂之上，所当日夜图画者，亦莫急于边防。迩年以来，虏患日深，边事久废。比者屡蒙圣谕，严饬边臣，人心思奋，一时督抚将领等官，颇称得人。目前守御，似亦略备矣。然臣以为虏如禽兽然，不一创之，其患不止。但战乃危事，未可易言，须从容审图，以计胜之耳。”^⑥为加强军事力量，张居正重用并全力扶持将领戚继光、殷正茂。戚继光（1528-1588）字元敬，号南塘，山东登州人。史载“继光在镇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宴然。继之者，踵其成法，数十年得无事。亦赖当国大臣徐阶、高拱、张居正先后倚任之。居正尤事与商确，欲为继光难者，辄徙去之。”^⑦张居正在写给蓟辽督抚谭纶的信中，对戚继光关切异常，嘱托谭纶提醒他在新任蓟辽总兵任上应注意的问题，殷切之情，溢于言表：“戚帅不知近日举动如何？折节以下士夫，省文以期实效，坦怀以合睽贰，

^① 《答甘肅巡抚侯掖川》，《张居正集》第二册《书牍》，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54页。

^② 《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407页。

^③ 《李贽文集》第五卷《四书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7页。

^④ 《答陆思山》，《李贽文集》第一卷《焚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63页。

^⑤ 《武经七书》是指《孙子兵法》《吴起兵法》《尉缭子》《司马法》《六韬》《黄石公三略》《唐太宗李卫公问对》。

^⑥ 《陈六事疏》，《张居正集》第一册《奏疏》，武汉，荆楚书社，1987年，第9页。

^⑦ 《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743页。

正己以振威棱，乃渠今日最切务也。相见幸一勉之。”^①殷正茂（1513-1592），字养实，号石汀，徽州府歙县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由行人选兵科给事中。历广西、云南、湖广兵备副史，迁江西按察使。史载“正茂在广时，任法严，道将以下奉行惟谨。然性贪，岁受属吏金万计。初征古田，大学士高拱曰：‘吾捐百万金予正茂，纵乾没者半，然事可立办。’”^②在给蓟辽督抚刘北川的回信中嘱托他要善待戚继光，云：“戚帅才略，在今诸将中诚为希有，幸公以道眼观之。”^③张居正还在信中谆谆告诫戚继光：“愿足下自处，务从谦抑。凡事关利害，宜直披情愫，虚心商榷而行，勿定执己见，勿心口异同，与人争体面，讲闲气；南北军情，务须调适，法行一概，勿得偏重；凡浮蠹冗食之人，悉宜除汰，蓄之无用，徒招物议。”^④美籍学者黄仁宇评价张居正对明朝军事防御的贡献时说：“没有文渊阁和张居正的全力支持，就没有强有力的蓟州军区和戚继光。”^⑤

张居正批评当时文臣武将云：“‘文臣事虚文而无实用，武将徇小利而无远图。’此二语最中边吏之膏肓，今若不破此套，而徒为整理云云，终成画饼耳。”^⑥有鉴于此，张居正日夜忧思，披肝沥胆，为重振明朝武备而宵衣旰食，更为明朝官员不懂军事而一闻边警便张皇失措而愤懑。张居正说：“仆内奉宸扆，外忧边境，一日之内，神游九塞，盖不啻一再至而已。奈何边臣故套难改，鲜有为国家忠虑者。而无识言官，动即建白，及与之论边事，一似说梦。近有一科臣，闻辽虚报，遂欲防守京城，浚濠堑，掘战坑以御虏者。虏在何处？而张皇如是，使人闷闷。”^⑦

张居正不仅自己对振兴武备明画深图，而且利用为万历皇帝讲课的有利条件开悟幼主，建言重视武备。史载张居正进谏幼主重视边备云：“上御文华殿讲读。辅臣张居正进讲《帝鉴图》汉文帝劳军细柳事。既反复开说，因奏曰：‘古人说，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如今天下承平日久，武备废弛，将官受制于文吏，不啻奴隶。夫平日既不能养其锋锐之气，临敌何以责其有折冲之勇？自今望皇上留意武备。将官忠勇可用者须稍假权柄，使之得以展布，庶几临敌号令严肃，士卒用命。今士大夫有识者皆曰：‘我祖宗用刀尖上挣来的天下，今日被笔尖儿上坏了。’且文武并用，乃长久之术。俗语说：‘文官把笔安天下，武将提戈定太平。’上曰：‘然。’因嗟叹久之。”^⑧

李贽对西北边事非常关切，这可从他对梅国桢的赞佩中得到印证。在明朝后期，梅国桢堪称智勇双全。李贽对此曾一再加以称道。宁夏兵变后，他曾感于人才凋零，朝廷乏识人之慧，故发愤撰写《二十分识》与《因记往事》两文，表达“识、才、胆”兼备的人才观，慨叹

^① 《与蓟辽督抚》，《张居正集》第二册《书牍》，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4页。

^② 《明史》卷二二二《殷正茂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907页。

^③ 《答蓟抚刘北川》，《张居正集》第二册《书牍》，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6页。

^④ 《答蓟镇总兵戚南塘计边事》，《张居正集》第二册《书牍》，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44页。

^⑤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79页。

^⑥ 《答督抚王鑑川计处黄昆二虏》，《张居正集》第二册《书牍》，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46页。

^⑦ 《答吴环洲论边臣任事》，《张居正集》第二册《书牍》，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33页。

^⑧ 《万历起居注》，万历元年三月初四日，转引自韦庆远《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489页。

当世能为朝廷所用的理想人才实在太少。然而，在《复麻城人书》中，他却又欣喜地说：“设早闻有梅监军之命，亦慰喜而不发愤矣。”^①在《与梅衡湘》一信中，李贽鉴于梅国桢愿“系单于颈”的壮志豪情，感慨地说：“今日之颈不在夷狄而在中国，中国有作梗者，朝廷之上自有公等诸贤圣在，即日可系也。”当他得知梅国桢毛遂自荐、慷慨请缨的壮举之后，便在《与友山》一文中由衷地表示了自己的钦佩之情：“今惟无江陵其人，故西夏叛卒至今负固，壮哉梅公之疏请也，莫谓秦遂无人也。”^②

李贽与张居正均有深厚的兵学素养，他们均注解《孙子》，精通兵法。张居正与李贽均精通兵法，是文武兼备之才，均注解了《孙子兵法》。李贽专作《兵食论》，以阐明兵食不二之观点。对《孙子兵法》进行评注时，间加己见。对仁诡、奇正、虚实、战守、彼己、动静等均有评点。张居正既是一位政治家，又是一位杰出的军事战略家，其深谋远虑、措置筹划莫不有的放矢、妥帖自然，对明朝的军事防御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兹略举几例加以说明：

1. 兵食论。张居正则说：“辽人素称忠勇，但苦兵寡耳。然欲足兵，必先足食，兵食既足，乃可言战。”^③又曰：“中州重镇，密迩畿辅，务农讲武，足食足兵，乃今日所最急者，余皆迂谈也。”^④

2. 战守论。张居正说：“大抵蓟镇之势，与他镇不同，其论功伐，亦当有异。盖此地远非边镇，切近陵寝，故在他真以战为守，此地以守为守；在他镇以能杀贼为功，而此地以贼不入为功，其势居然也。”^⑤

3. 用兵以奇。张居正说：“攻险之道，必以奇胜。今可征兵积饷，为坐困之形，而募死士，从间道以擣其虚。先年破香鑪，取洮岷，皆用此道。若不奋死出奇，欲以岁月取胜，此自困之计。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⑥

4. 知彼知己。张居正说：“夫兵家之要，必知彼知己，审虚实，而后可以待敌，可以取胜。今无端听一讹传之言，遽尔仓皇失措，至上动九重之忧，下骇四方之听，则是彼己虚实，茫然不知，徒借听于传闻耳。其与风声鹤唳，疲于奔命；久之懈弛不备，然后猝然而至，措手不及。是在彼反得先声后实，多方以误之之策，而在我顾犯不知彼己、百战百败之道。他日边臣失事，必由于此。”^⑦

（五）有相近的哲学倾向——以儒为主，出入佛道。泰州学派是明朝中后期的一个思想和学术流派，其门徒众多，影响很广，讲学活跃。泰州学派是明朝中后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王阳明心学合乎逻辑的发展。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提出“百姓日用即道”、“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知行合一”、“安身立本”、“人人君子”等重要思想。张

^① 《李贽文集》第一卷《焚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63页。

^② 《李贽文集》第一卷《焚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64页。

^③ 《与张心斋计不许东虏款贡》，《张居正集》第二册《书牍》，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79页。

^④ 《答总宪吴太恒》，《张居正集》第二册《书牍》，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46页。

^⑤ 《答阁边鄙文川言战守功阙》，《张居正集》第二册《书牍》，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16页。

^⑥ 《与蜀抚曾确卷计剿都蛮》，《张居正集》第二册《书牍》，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06页。

^⑦ 《论边事疏》，《张居正集》第一册《奏疏》，武汉，荆楚书社，1987年，第183页。

居正显然受到泰州学派的影响。他不仅在早年对禅宗感兴趣，而且“这种兴趣促使他在翰林院供职期间就和泰州学派接近，并且阅读过王艮的著作，考虑过这种学术在政治上实用的可能性”。^①张居正与泰州学派的不少学者有深交，王敬所就是其中之一，而被张居正视为知己。张居正致信说：“今知我者，非公其谁？”^②张居正与泰州学派后学聂豹、周友山、耿定向、罗汝芳相交甚厚，有的还在仕途上受其擢拔重用，他们亦多有书信往来。张居正既吸取泰州学派有益于其改革及政治需要的内容，又压制其过于活跃和张扬的讲学活动。张居正在奏疏中说：“今后各提学官督率教官生儒，务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著实讲求，躬行实践，以需他日之用，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招他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谭废业，因而启奔兢之门，开请托之路。”^③

张居正不仅对泰州学派多有认同，而且对阳明心学亦不完全排拒，甚至有所期待，认为阳明心学的学术路径是对传统儒学的创新。张居正说：“自孔子没，微言中绝，学者溺于见闻，支离糟粕，人持异见，各信其说，天下于是修身正心真切笃实之学废，而训诂词章之习兴。有宋诸儒，方诋其弊。然议论乃日以滋甚，虽号大儒宿学，至于白首犹不殫其业，而独行之士，往往反为世所姗笑。呜呼！学不本诸心，而假诸外以自益，祇见其愈劳愈敝也矣。故宫室之弊，必改而新之，而后可观也；学术之弊，必改而新之，而后可久也。”^④

与所有士大夫知识分子一样，张居正也常常陷入出世之想与入世之功的矛盾之中。入世为儒者，出世为佛道。这正是张居正在思想上与李贽契合之处。李贽自述：“年甫四十，为友人李逢阳，徐用检所诱，告我龙溪先生语，示我阳明先生书，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实与真佛真仙同，虽倔强，不得不信之矣。”^⑤张居正说：“正少而学道，每怀出世之想，中为时所羁縻，遂料理人间事。前年冬，偶阅华严悲智偈，忽觉有省，即时发一弘愿：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于自身求利益。去年，当主少国疑之时，以藐然之躯，横当天下之变，此时唯知办此深心，不复计身为己有。幸而念成缘熟，上格下孚，宫府穆清，内外宁谧。而正以退食之余，犹得默坐澄心，寄意方外，如入火聚，得清凉门。以是知山寺幽棲，风尘寓迹，虽趋舍不同，静躁殊途，其致一也。”^⑥李中溪，即李元阳，云南大理人，嘉靖五年进士，曾任江阴知县、荆州知府、户部主事、监察御史等官。擢拔张居正于童试第一，故有师生之谊。不满官场污浊与黑暗而辞官归家，与谪居云南的杨慎相契甚深。张居正一方面有寄意方外之想，另一方面又有许身为国之念。万历元年张居正答吴尧山云：“二十年前，曾有一弘愿：愿以其身为荐荐，使人寝处其上，溲溺之，垢秽之，吾无间焉。”^⑦这种出世之想与入世之功在张居正那里得到了完美的结合，这在历代士大夫知识分子中都是极其罕见的，非有大智慧、大忠勇、

^①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12页。

^② 《答河漕王敬所》，《张居正集》第二册《书牍》，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98页。

^③ 《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张居正集》第一册《奏疏》，武汉，荆楚书社，1987年，第174页。

^④ 《宜都县重修儒学记》，《张居正集》第三册《文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64页。

^⑤ 李贽《阳明先生年谱后语》，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604页。

^⑥ 《答李中溪有道尊师》，《张居正集》第二册《书牍》，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49页。

^⑦ 《答吴尧山言弘愿济世》，《张居正集》第二册《书牍》，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79页。

大勘破、大牺牲不能为。而此中旨蕴在张居正身上得到了儒、道、佛三家的相互融通。且看张居正所言：“以善养人，与物一体，皆执事所习闻者。衣中系珠，不寻自获；富家乞子，忽复来归；满中七宝，受用无量。”^①又曰：“今日静中悟得，心体原是妙明圆净，一毫无染，其有尘劳诸相，皆由是自触。识得此体，则一切可转识为智，无非本觉妙用。故不起净心，不起垢心，不起著心，不起厌心，包罗世界，非物所能碍。”^②

（六）有相近的学术主张——斥虚谈，主实学。张居正对士习文风多有不满：“比来士习人情，渐落晚宋窠臼。中有识者，虽心忧之，而不敢言。”^③在为学上，张居正对程朱理学空言性理、穿凿附会持批判态度，提倡求实学、办实事、用实心、尽实力，主张革故鼎新。明朝讲学风气炽盛，空言心性，不涉实际。张居正表明自己的态度说：“吾所恶者，恶紫之夺朱也，莠之乱苗也，郑声之乱雅也，作伪之乱学也。夫学，乃吾人本分内事，不可须臾离者。言喜道学者，妄也；言不喜者，亦妄也。于中横计去取，言不宜有不喜道学者之名，又妄之妄也。‘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言不宜不喜道学之为学，不若离是非，绝取舍，而直认本真之为学也。孔子自言，人不如己之好学，三千之徒，日闻其论说，而独以好学归之颜子。今不穀亦妄自称曰：‘凡今之人，不如正之实好学者矣。’”^④张居正主张实学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不能以学术影响和阻挠君王之法的实行，反对空谈心性，主张务实守法。张居正说：“明兴二百余年，名卿硕辅，勋业煊赫者，大抵皆直躬劲节，寡言慎行，奉公守法之人。而讲学者每诋之曰：‘彼虽有所建立，然不知学，皆气质用事耳。’而近时所谓知学，为世所宗仰者，考其所树立，又远出于所诋之下，将令后生小子何所师法耶？此仆所未解也。仆愿今之学者，以足踏实地为功，以崇尚本质为行，以遵守成宪为准，以诚心顺上为忠。”^⑤可见张居正主张实学实事和遏制虚谈是为了“遵守成宪”，“诚心顺上”，以保障朝廷之法（实际上是君王意志）的实施。

李贽发扬了泰州学派王艮“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直截了当地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这与张居正提倡的经世实学主张正相吻合。张居正说：“学不究乎性命，不可以言学；道不兼乎经济，不可以利用。”^⑥又说：“学问既知头脑，须窥实际。欲见实际，非至琐细、至猥俗、至纠纷处不得稳贴……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学问不透。”^⑦所以，他对学者提出了殷切的希望：“仆愿今之学者，以足踏实地为功，以崇尚本质为行。”^⑧正因为张居正主张实学，罢黜虚浮，所以才能推动各项改革，也才能使趋向没落的大明王朝一度呈现“中兴”气象。

^① 《答少参吴道南》，《张居正集》第二册《书牍》，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39页。

^② 《寄高孝廉元谷三首》，《张居正集》第二册《书牍》，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293页。

^③ 《答少司马杨二山》，《张居正集》第二册《书牍》，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页。

^④ 《答宪长周友山讲学》，《张居正集》第二册《书牍》，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49页。

^⑤ 《答南司成屠平石论为学》，《张居正集》第二册《书牍》，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17页。

^⑥ 《翰林院读书说》，《张居正集》第三册《文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77页。

^⑦ 《答罗近溪宛陵尹》，《张居正集》第二册《书牍》，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288页。

^⑧ 《答南司成屠平石论为学》，《张居正集》第二册《书牍》，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17页。

三、李贽与张居正在个性及生活态度上亦有共同之处。

(一) 同样具有叛逆精神——不满现状，希望打破常规。张居正改革历尽艰难，终于在万历皇帝和李太后的支持下步步推进，并取得了初步成效。故张居正深有感触地说：“夫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功。然又必遇非常之时，而后其功可成。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惑焉。’”^①张居正一方面主张遵守礼统法统，另一方面又主张变法创新：“法不可以轻变也，亦不可以苟因也。苟因则承敝袭舛，有颓靡不振之虞，此不事事之过也。轻变则厌故喜新，有更张无序之患，此太多事之过也。”又说：“夫法制无常，近民为要。古今异势，便俗为宜。荀卿曰：‘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是俗儒者也。’此欲法后王矣。两者互异，而苟为近焉。何也？法无古今，惟其时之所宜，与民之所安耳。”^②

李贽之所以狂怪，实际上是不满于明朝的因循守旧和了无生机，他希望人人有童心、真心，希望打破阶层固化，人尽其材，物尽其用，主张男女平等，圣凡一律，主张社会按其自身的规律发展与运转，这些无不切合张居正之心意。所以，可以说张居正和李贽都是不满现状之人，都是主张打破常规之人，只是表达方式和行为方式不同而已。

(二) 有相近的生活志趣——清简自处。李贽在姚安知府任上并无积蓄，生活清贫。弃官之后更是仰赖好友周济度日。其生活极为清简，一心读书著述，直到自刎狱中。张居正秉政之后，虽也时有奢华的排场，但其内心是向往清简的，也在大多数时候保持了清简的生活习惯。所以他拒绝别人为他置买房屋，也拒收了许多贿赂。明朝中后期官场风气愈益不正，达官贵人纷纷增扩宅第。张居正拒绝亲家刘小鲁在湖北当阳的风景胜地玉泉寺为他买田结庐，说：“今身羈尘鞅，归期未卜。即便得归，亦不过芒鞋竹杖，与闲云野鹤徜徉于烟霞水石间，何至买山结庐，为深公所笑耶？”^③张居正劝告僚属们不要以世俗之心度其心，说自己平生最不喜矫饰虚假：“即诸君爱我，亦不宜用世俗相处也。仆平生耻为矫饰，其所云者，悉出赤悃，万惟垂亮。”^④

(三) 同样有论知己之论——叹知己难觅。张居正身在官场，处于政治旋窝，面对的矛盾复杂尖锐，比常人更加需要“知己”之助力，故在信中多次提及知己之难觅。张居正说：“世所称为知己者，谓能知其心也。今知我者，非公其谁？倘以执事者之有间，缀之以瓊玖，俾永其传，则覆瓿之诮，庶可免矣。”^⑤虽然其初衷是希望官员之间能坦诚相待，不要互相讥诮与挤压，而应成为“知己”，但其“知己难觅”之苦闷亦表露无遗。李贽《初潭集》卷十九《师友》中有“知己”篇，云：“伊敏与班彪相厚，每相与谈，常晏暮不食，昼即至冥，夜彻旦。彪曰：‘相与久语，为俗人所怪。然钟子期死，伯牙破琴，曷为陶陶哉？’”李贽由此发表感慨曰：“欲得永夕陶陶，难免俗人怪骂；欲免俗人怪骂，安得永夕陶陶乎？陶陶是

^① 《答河道徐凤竹》，《张居正集》第二册《书牍》，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47页。

^② 《辛未会试程策》，《张居正集》第三册《文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8页。

^③ 《答棘卿刘小鲁言止创山胜事》，《张居正集》第二册《书牍》，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67页。

^④ 《与楚抚赵汝泉言严家范禁请托》，《张居正集》第二册《书牍》，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38页。

^⑤ 《答河漕王敬所》，《张居正集》第二册《书牍》，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98页。

我受用，怪骂是伊，何妨？我今亦有怪骂，亦不见陶陶，伤哉！”^①言外之意，若要求相知之乐，则大可不必在意俗人怪骂；若要在意俗人怪骂，则自无相知之乐。此外，李贽记述禽息与百里奚相知；史鱼与蘧伯玉相知；子产与子皮相知；向秀与山涛相知，与嵇康、吕安友善；支道林与法虔相知；许玄度与刘尹相知。他们之中，甚至有以生死酬知己者。李贽据摭其相知之趣闻雅事，最后伤感地说：“知己实难，吾何以死也？”^②周友山既是李贽的好友，也是张居正的好友。李贽在信中劝导周友山说：“书中‘且负知己’四字甚妙！惟不负知己，故生杀不计，况毁誉荣辱得丧之小者哉！江陵，兄知己也，何忍负之以自取名耶？……视为知己死，死且甘焉。”^③这既是劝导周友山不要辜负知己张居正，也是表明自己的“知己”之见。

（四）张居正的恩师李元阳与李贽有相似的人生经历和个性。李元阳（1497～1580）字仁甫，号中溪，别号逸民，明代大理府太和县人，白族。据《荆州府志》载：“李元阳，大理人，嘉靖中知荆州。旧堤圯，七州县皆患水，治之无成绩；元阳身任之，再期而成。及忧归，一府皆垂泣远送之，祠祀焉。”李元阳对张居正在童试中有擢拔之恩^④，其经历与李贽相似，做过荆州知府，致仕后以儒家弟子与佛家弟子自居，还与李贽见过面。张居正与李贽又有共同的朋友耿定向和周思敬，而且二者都是张居正的亲信。这些都造就了张居正与李贽有许多的共同点，注定了他们的心灵相通，立场相同，也就注定了李贽对张居正有千古不易的“宰相之杰”的评价。此可谓“惺惺相惜”、“知己相酬”矣。

综上，李贽与张居正有很多的共同之处，加之张居正改革顺应了时代潮流，代表了有良知的士大夫知识分子的革新愿望。张居正与李贽一样主张改革和创造，同样追求自由而不得，其生命同样为时代所扼杀，其结局同样是悲剧，只是他们选择的道路不同，表达的方式相异。然而，他们心灵相契，精神相通，思想相通，这就注定了李贽对张居正的欣赏与推崇，也在冥冥之中注定了李贽的命运结局亦如张居正之悲剧。

(作者单位 黄冈师范学院)

^① 《李贽文集》第五卷《初潭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96页。

^② 《李贽文集》第五卷《初潭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97页。

^③ 《与友山》，《李贽全集》第一册《焚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64页。

^④ 关于擢拔张居正者，也有人认为是巡抚顾璘，但据现存张居正万历三年（1656）《答中溪李尊师论禅》曰：“正昔童年，获奉教于门下，今不意遂已五旬。”在其他信中，张居正也称李元阳为“尊师”。张居正拟欲退隐后与“尊师”在大理相会，但未能如愿，引为终身遗恨。